

舍家为国,追寻红色的远征

第一路小分队·记者手记

江西·福建·广东 6月11日-6月25日

在闽西长汀中复村的钟宝忠老人家中,一副门联格外显眼:“要想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下一代”。门联向內,是一个简陋的红色家庭展——3年前,已近九旬的老人将大半生积蓄的红军故事打印成册,贴在瓦墙上,以此勉励后人。

中复村是当年红九军团长征的“客公处”。如果不是亲自来到这里,很难想象,85年前,从这里走出的一代人,带走了行囊和生命,却留下信仰,至今照耀着后人。

在“记者再走长征路”活动中,第一路小分队沿着江西、福建和广东三省,探寻当地和长征有关的记忆。不同于血战湘江的残酷,四渡赤水的快意,同赣两省是当年红军长征集结的出发地,发生在这里的许多故事缺少惊心动魄的细节,但它们无不提示着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为什么选择追随红军?

在中复村,在闽西红色故土,这个问题如影随形。在中复村的红军桥头,有一条高一米五左右的刻痕,这是红军游击队的藏兵门框:一丈长枪加一柄刺刀的长度,可以确保新兵背得起枪,走上战场。当年,为了得到这条刻痕,有人往草鞋里塞纸,有人踮起脚尖,更有人干脆半夜起来,偷偷将纸改矮,“骗”进红军队伍……

后人赋予了这条刻痕一个悲壮的名字——生命的等号线。据记载,在参加长征的8.6万中央主力红军中,有2.6万闽西儿女,然而到达陕北时,这支队伍仅剩下2000多人,长征每一华里就有一位闽西儿女倒下。

事实上,选择背死追随的人,多数心里都还有牵挂。当年红军北上,来自中复村的17位热血青年一同报名参加红军,他们在出发前跪地起誓:谁活着回来,谁就娶他们的父母为妻。

即使知道超过这条线即完成了向死而生的选择,为何仍有人舍家为国,前赴后继?在闽西红色文化讲解员钟鸣时也是一名红军

后人,他告诉我们,当地百姓向来不懂“主义”二字,但当看到穷苦的人分到了田地,备受欺辱的人得到撑腰,他们便萌生了最朴素的信仰,那就是跟着共产党找出路。“尽管知道会有牺牲,但对于当地百姓来说,幸福时是红军用牺牲换来的,值得用生命去捍卫。”钟鸣说,大家懂得,这是要千千万万人付出牺牲的事。他说,这就不难解释,如今走进长汀一些村庄,为何几乎家家户户都能翻出一本烈士证。

随着主力红军出发的青年农民,最终将信仰变成戎装。湘江战役中,6000名闽西子弟组成的“绝命后卫师”红三十四师为掩护主力红军突围,与数十倍于自己的敌人殊死搏斗,几乎全数牺牲。

而留在这里的人则将信仰铭刻进石碑,当我们回到位于闽赣交界的长汀县四都镇红都村,郁郁葱葱的山林间一眼可瞥见一方青石碑。那是1933年福建省委为58名烈士立起的墓碑,是目前发现的时间最早的苏区烈士纪念碑。1935年,主力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开展疯狂报复,村在敌流弹一空的同時,墓地也被摧毁。匪徒走后,当地百姓含泪扶正墓碑,重新安葬遗骨,并种上翠柏、青松,最终将墓地保存下来。

在一号作为讲解员的四都镇文化站站长赖光耀告诉我们,几十年来,他一直在努力确定烈士身份和他们的生平事迹,为此四处奔波采访。在长汀,许多红军后人坚守祖辈的信仰,继续发扬着红色文化。

站在红土地上,望着青石碑,人们的思绪不会不由自主飘到85年前。当年,一代人踏上追寻信仰的远征,而如今,一代人在这片土地继续书写着信仰。

(本报记者吴剑锋)

第一路小分队共播发文字、图片、音视频、新媒体等各类稿件360余篇(组),其中新华社金头条《跨越“第一渡”长征出发地“换了人间”》等重点稿件均采用超230家;新华视点微博“一起重走长征路”话题阅读量超7000万,为主动策划营造了热烈声势,成功打响报道第一枪。

长征路上,见证信仰的力量

第二路小分队·记者手记

湖南·广西·贵州 6月26日-7月14日

共产党的信仰是什么?在贵州的大山里,重走红军走过的地方,我找到了答案。

贵州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境内绝大部分是山地,很多地方交通不便,偏远闭塞,因此,这里是第二路的聚首,很重要的内容是爬山,很重要的“交通工”是双鞋和双脚。

印象最深刻的是采访以险峻著称的娄山关,虽然如今上山有石阶,未找道,但仍觉得很艰难,几乎手脚并用登山,山顶已是气喘吁吁,触摸着那些战壕和掩体,不由得心里感慨万千。当年这些当地人进军,红军战士究竟是如何攻克如此天险?悬崖与残阳映入眼帘,重温毛主席的《忆秦娥·娄山关》,也会体会到那种悲壮又豪迈的心情。

站在山顶,远眺绵延起伏的莽莽大山,内心总会升起一种苍凉感。我想,84年前,当中央红军来到贵州山乡,到处都是深山老林,自然条件极度恶劣,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生存难度极大,随时面临着地崩石裂的严重威胁,促使他们战胜一切的信心和力量,来自何方?

81岁的娄山关英义勇讲解员开基是当地人,他告诉我们,国民党部队到了村里,强行牵猪夺牛,一分钱都不给,家里有男娃儿的还要被拉壮丁。他的父母故意给小儿子起了个女孩名字“么姑”,才幸逃过一劫。

与国民党部队截然不同,红军队伍到了贵州,虽然自己都已吃不饱穿不暖,但坚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号召每个战士准备一样礼物,作为第一次到贵州给群众的见面礼。很多战士拿出自己的衣服、毛巾,送给劳苦百姓。

红军与群众血肉相连,同生共患难,正如湖南汝城“半条棉被”的故事,或有一床被子,也要分半条给你,这是共产党的信仰,也是共产党的初心。

在贵州石阡县团山,我采访得知,凶残的敌人裹挟老百姓做“人墙”,本可杀出一条血路的红军不忍开枪,百余名红军战士毅然跳下团山悬崖。他们宁可牺牲自己,也绝不伤害老百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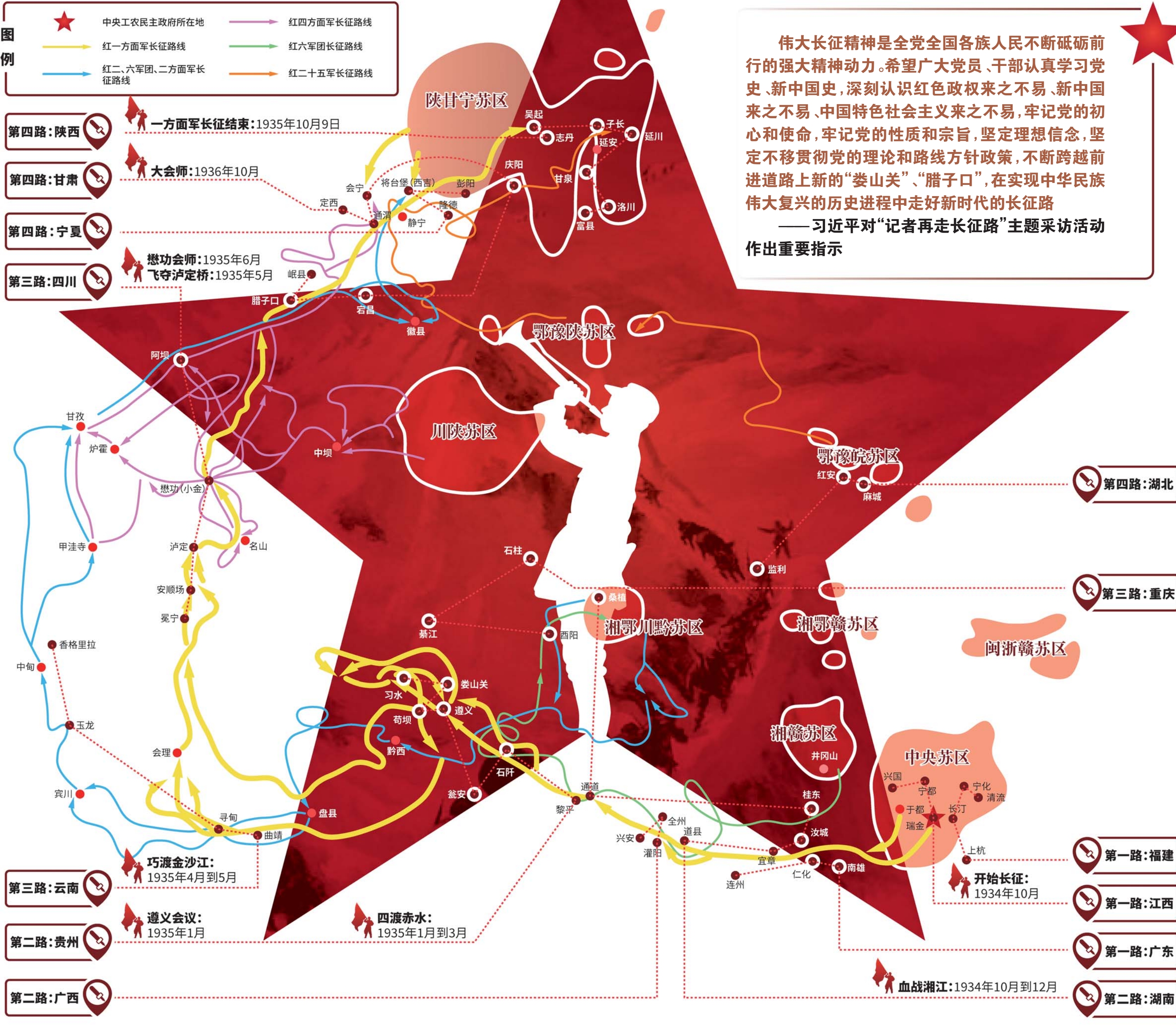
国民党执掌红军是“共匪”,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红军队伍所作所为让他们真切感受到,红军和自己才是一家人。

湖南、广西、贵州这一段路程,在红军长征史上最惊心动魄,遭遇了敌军最凶险的围追堵截,付出了出发以来最壮烈的牺牲,遭受着严重的清流战役危害,但正是在这一程,红军通过召开遵义会议,实现了第一次伟大转折,在思想上扭转混乱,转兵踏上新征程。

为什么红军能够实现伟大转折,进而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我想,除了因为在实践中找到了正确的道路,还因为红军来自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他们坚守着人民福利的信仰,得到了最广大人民的民心,获得了最有力的支持,而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能够绝地逢生,屹立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

(本报记者李惊亚)

第二路小分队共播发文字、图片、音视频、新媒体等各类稿件380余篇。其中新华社金头条《伟大转折是怎样发生的——重回遵义会议现场》历经苦难而淬火成钢——红军为什么能冲出绝境?等重点稿件均采用超200家,在全社会激起一波弘扬长征精神的新热潮。



感受长征精神 深入践行“四力”

通过追寻红军长征走过的足迹,曾经无数次从书本中读到的伟大长征,就这样鲜活而真切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走进心里震撼灵魂。

长征路上,理想信念的力量无处不在。走在今天的泸定桥上,尽管已覆有结实的木板,过桥时仍感到桥身左右摇晃,很难平衡重心。透过桥板缝隙向下看去,咆哮的大渡河翻滚着疾速向前,令人心惊胆寒。然而就在这里,红军战士曾上演了飞夺泸定桥的壮举。前不久,也就在这里,当年舍桥勇士刘金山的儿子刘东升讲述了他的父亲的故事。

事后多年,他父亲刘路牌一直到手掌全是伤疤,夏天穿短袖时特别明显。他反复追问才知道,那是夺泸定桥时被烧得滚烫的铁索烫伤的。据说当时路牌被烫得滋滋冒烟,拿桥以后,握大刀的手被烫得皮都粘在刀把上,只能连皮肉一起撕下来。刘东升说,我问过父亲当时是怎么想的,父亲说,就是一心想着怎么爬过去,尽快爬过去,把敌人给消灭掉,这就是任务。

父亲他们之所以把生死置之度外,就是想消灭敌人,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在渡江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包括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雪岭和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面对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党领导红军,几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苦难而淬火成钢,归根到底在于心中的远大理想和革命信念始终坚定执着,始终闪烁着火烈的光芒。

长征路上,洒满了军民相依的深情。长征所到之处,红军用严明的纪律、积极的宣传打动了老百姓的心,也播撒下革命的火种。

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彝海结盟纪念馆里,我们看到了一幅红军旗的复制品。原来彝海结盟成后,刘伯承把一面红军旗赠给了小叶丹。红军走后,国民党追究小叶丹“通共”罪责,杀害小叶丹,强逼果基家交出1.2万两白银和120头羊,小叶丹宁肯家荡产,也不愿交出彝家红军旗。后来小叶丹死于一次伏击。在丈夫死后,小叶丹宁肯家荡产,也不愿交出彝家红军旗。后来小叶丹死于一次伏击。在丈夫死后,小叶丹宁肯家荡产,也不愿交出彝家红军旗。后来小叶丹死于一次伏击。在丈夫死后,小叶丹宁肯家荡产,也不愿交出彝家红军旗。

无数个踊跃参军的群众,汇聚起人心向善的磅礴力量,帮助红军在艰难困苦中走出一条希望的路,新生的路,胜利的路。那些红色的记忆,那些军民相依的深情,刻在历史的年轮里,代代相传。

道路的正确,最终成就了历史的必然。坚持党的领导的红军战士,深深扎根人民的红军战士,不畏牺牲、被理想信念武装起来的红军战士,不可战胜!

长征路上,初心依然滚烫。

此次再走长征路活动,既是不忘初心的深刻学习,也是作为新华社记者,在新时代努力践行“四力”,将长征精神贯彻到新闻报道工作中的深入实践。

(本报记者胡翔)

第三路小分队共播发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各类稿件250余篇,其中新华社金头条《前进,向着光明的方向——寻访金沙江红色印记》《大渡河畔传奇迹——感悟红军长征的密利密钥》等重点报道,再现红军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传奇战役。

第四路小分队共播发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各类稿件250余篇,其中新华社金头条《永远的红旗带——从革命长征路到发展新征程》《红星,从这里照耀中国——陕北见证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等重点稿件引发热烈反响,为“记者再走长征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第一路小分队作品

▶▶ 这里是长汀,红九军团两万五千里长征“客公处”所在地

▶▶ 当年,他们这样走上长征路

第二路小分队作品

▶▶ 界首渡口:红军从这里过湘江

▶▶ 29岁的“断肠师长”陈树湘,用生命践行绝对忠诚

第三路小分队作品

▶▶ 6条小船挽救3万红军

▶▶ 卫星视角再现红军飞夺泸定桥军事奇迹

第四路小分队作品

▶▶ 列宁小学:传承红色基因,培养革命接班人

▶▶ 84年前,红军用它“围粉”无数

伟大长征精神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不断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希望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坚定理想信念,坚定不移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不断跨越前进道路上的“娄山关”、“腊子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习近平对“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作出重要指示

那些牺牲,需要被永远铭记

第三路小分队·记者手记

重庆·云南·四川 7月15日-7月31日

横断山脉的大河险滩,崇山峻岭,茫茫草原上至今还留着红军长征的印记。在这些印记中,我们感受到那震撼人心的牺牲精神。

在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广场,22个石碑只有5个刻有舍桥勇士的具体姓名。讲解员复说,这是为了纪念飞夺泸定桥的22个勇士,大部分战士至今无法找到,但他们从未放弃寻找。

在红军长征途中最为悲壮的行程之一,非战斗减员数量超过万人。在红军副团长陈德林休体村,我们见到了一座烈士墓,墓碑上写着“工农红军烈士之墓”。当地村民说,这个墓是从山顶迁下来的。休体村村口的石碑上这样介绍——红军烈士墓位于红原市南部的亚克夏山山口上,海拔4800米,距副团长陈德林13公里,该墓是为纪念当年长征时在此牺牲的红军指战员而建。

在副团长陈德林休体村原村支书范亮告诉我们,她小时候常听村里老人讲起红军翻山的情景——山路上不时坐着或躺着红军战士,有的永远“睡”着了,他们背覆如雪。

在休体村,村里党员每年都要前往烈士墓,以各种方式纪念那些长征中牺牲的英雄。今年7月1日,记者也正好碰到他们拜谒着党旗,沿着当年红军翻亚克夏山的路,在山腰处开展活动,接受红色教育。

“我们不想忘记他们,今天的我们还要继续奋斗,这个小山村还要进一步振兴。”范亮说,这样才不会辜负牺牲在当地的先烈。

红军长征在四川期间,茫茫草地让红军付出了更加巨大的代价。1935年8月,红军开始踏上征服草地的艰难历程。在阿坝州,红军当年走过的松潘大草地包括如今的松潘县、红原县、若尔盖县等地。

若尔盖第一位名叫阿炳的红军后代告诉我们,他的父亲谢金钟在包座战斗中负伤,倒在战场,等他醒来,红军已离开。谢金钟便以土匪身份为掩护,在

若尔盖县唐古乡周边活动。阿炳说,父亲在世时,每逢清明,总是在碗里放些面块,旁边还放着一把木工凿刀,进行祭奠。阿炳长大后才知道,父亲在祭奠两个人:一个是跟随沼泽地的年轻小战士,他是跟父亲一起在南充加入红军的小老乡;一个是父亲的木工师傅。

“父亲一直没有忘记那几名小战士,我们今天也不能忘记那些牺牲在雪山草地上的先辈们。”阿炳说,他们虽然不是在最激烈的战斗中牺牲,但这种牺牲仍然要求永远铭记。

在若尔盖县唐古乡,我们还见到一座名为“胜利曙光”的雕像。一群红军战士或坐着、或躺着,环绕在刻有“中国工农红军班佑烈士纪念馆”的石柱周围,不远处是一位拿着望远镜的指战员。

雕像的底座,刻着摘自《王平回忆录》的语句:“……我用望远镜向河对岸观察,那边河面上坐着至少有七八百人。我先带通讯员和侦察员走过去看看情况。一看,哎呀!他们都静静地背靠着坐着,一动不动。我逐个察看,全都沒气了。我默默地看着这悲壮的场面,泪水夺眶而出……”

英雄不问出处,但英雄需问归处。真正的英雄,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红军昔日干齐沼泽地,当年被称为“死亡之海”。这里并立着一座红军追悼地纪念碑,碑的底座上有一面这样写着:任何民族都需要自己的英雄。真正的英雄具有那种超越的悲剧意味:牺牲,但不参加战败。这就是民族脊梁。他们历经苦难,我们获得辉煌。

(本报记者周吉甫)

铁的纪律,化为军民鱼水情

第四路小分队·记者手记

湖北·陕西·宁夏·甘肃 8月1日-8月18日

连续18天,行程十余地,行程数千里,采访上百人,读书破千行,报道数十条,被报道过的历史实迹,为那些党史留名却或没留下名字的英雄们流泪……在此,我想讲一些没有写进报道里的故事。

有一首悲壮慷慨欢快的歌,当过兵的都听过,这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编成歌曲填入。11月,在夜渡与中央红军会师大渡河,红二十五军同集体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人唱过万人传”。

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这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包括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行人骂人,不损坏庄稼等。

当时的红军,被敌人的反动宣传妖魔化,赤发青眼,共产共鬼,吃人……这样的宣传,让很多地方都出现过“红魔鬼”现象——听说红军要来,百姓就逃出去躲。可百姓渐渐看到,红军是一支怎样的军队——

1928年秋,湖南酃县一带的一个老者在自家草屋里发现一个布包,里面有五块银圆和一张字条,字条写着:亲爱的老乡,我们是红军,为了打白匪,我们吃了你的红薯,现留下银圆五块请收下! 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到达甘肃腊子口,部分红军住进藏寨朱立村。一位十七八岁的通讯员引

来时不小心把房东家的党证打碎,因为不名一文,指导员便要求他把手上的红毛衣留下作为赔偿。这件红毛衣,是在四渡赤水牺牲的红军父亲留给他的。房东老阿炳实在不忍心,但党证被毁,老阿炳放下了红毛衣,却拿出自家一件羊皮袄给小通讯员,指导员又给老阿炳留下了一块白洋。

提起那段艰难险阻的历史,我们想到的也许都是红军打仗、练兵等,而忽略了其他。事实上,苏区的纪律建设一直抓得很紧。

早在1931年9月,鄂豫皖苏区便基本形成了以党的监察机构和苏维埃政府的监察机构为主体的监察组织系统。革命法庭下还有国家公审处,鄂豫皖苏区国家公审处处长程子华是首位国家公审人。曾有苏鄂豫皖政府主席在其母亲去世时,私用了一口没收地主的棺材,被撤职处分。

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与陕北红军会师为红十五军团。为加强政治纪律教育,军团政治部秘书长征担和宣传科长华清借用鄂豫皖苏区流行的《土地革命完成了》歌谱,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编成歌曲填入。11月,在夜渡与中央红军会师大渡河,红二十五军同集体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人唱过万人传”。

爱民如天,与民相依,把根深深扎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怎么会不枝繁叶茂、生生不息?当年红军的胜利密码,永远不会失灵。

(本报记者王若辰)

